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李清照诗词选

陈祖美◆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代诗词典藏本

袁行霈题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李清照诗词选

陈祖美◆撰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清照诗词选/陈祖美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古代诗词典藏本)

ISBN 978-7-100-10782-2

I.①李… II.①陈… III.①宋诗—诗集②宋词—
选集 IV.①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73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李清照诗词选

(古代诗词典藏本)

陈祖美 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782-2

2015年2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 18.00 元

古代诗词典藏本

主 编 袁行霈

副主编 刘跃进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

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

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

策 划 厚艳芬

走出学术象牙塔

刘跃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但精品甚少。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这样一种偏见，必须改变。

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近来翻阅《王伯祥日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诗经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的工作，印象深刻。每一部书的编纂，从篇目的确定，到注释的推敲，都经过反复打磨。然后内部油印，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经过这样几个回合，才最后定稿，公开出版。这样的书，阐释经典，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多数印行在数

十万册以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说易行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没有普及，何来提高？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现在，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这种观念值得商榷。毫无疑问，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给予尊重，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道理不言自明。但同时，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大众所认知。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依靠群众。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那就成了无根之木，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这道理不言而喻。

启示之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康德《逻辑学讲义·导论》说过：“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

人，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提高在前，普及在后。普及不是随意发挥，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没有深入的研究，哪来生动的普及？王伯祥、余冠英、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对学者而言，深入易，浅出难。浅出所以难，是对作者要求高，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才不至于把经念歪。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遇到不懂的地方，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而要讲给大众听，就无法藏拙。因此，做好普及工作，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积学储宝、研阅穷照。只有这样，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也才会更有意义。

启示之三，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

“古代诗词典藏本”，恰逢其时，其意义自不必多说。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以“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为追求，其选家皆术有专攻，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研究特点不同，因此“古代诗词典藏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这里仅举数例：李山教授的《诗经选》，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诗经世界”的新旅——重新审读其字句、篇章，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勾勒其礼乐背景，体味其文化意蕴，欣赏其风雅艺术，考察其歌唱方式……《王维诗选》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王维诗乃诗之哲学，亦可谓哲学之诗。故其选评，敏于感悟，精于赏玩；其评赏文字，巧于切入，工于辞采。《李清照诗词选》的作者陈祖美先生，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心事”——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

无须赘言，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这一点，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就特别强调自己“注”的特色，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希望这种不拘一格、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贯彻丛书始终，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既不乏前沿理论、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

的精品选本。

丛书付梓在即，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这种信任让我感动。确实，好书好序，相得益彰。如果翻开一部新书，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就好像刚出门，便遇上障碍物，诚可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叫人眉蹙。顾炎武《日知录》早就告诫：“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贸然作序，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我想，好书确实需要介绍，好意也要有所表达。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六十年前，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取得空前成就，影响至今。我们相信，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古代诗词典藏本”，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2014年5月30日

草于京城爱吾庐

导 言

一

缘起 被置于一本书或前或后的“前言”“序”“跋”等，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体，尽管字面有别，而其体例、功能却大同小异且尽人皆知，无须赘言。在此，笔者所要敬告读者的是本人每逢撰写此类文稿时的良苦用心。鉴于连同这本新书在内，有关李清照的拙编著共计十二种^①。遵循出版方要求，每一本都要有一篇“导言”，而但凡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编著者不会人云亦云，也不应该炒自家的冷饭。

① 前十一种关于李清照的拙编著分别是：《李清照作品赏析集》（巴蜀书社1992年9月第一版，1996年8月第二版；之后版权出让台湾）、《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2011年4月平装大字本第一版）、《中国诗苑英华·李清照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李清照新传》（北京出版社2001年9月版）、《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李清照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版）、《李清照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3月、5月两次印刷；2012年11月改装第一次印刷，2013年11月第二次印刷）、《齐鲁文化经典文库·漱玉词注》（齐鲁书社2009年4月版）、《远东经典·古代卷〈李清照诗词文选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李清照诗词文选评》（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漱玉词〉笺译·心解·选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然而，同一类的文稿，要想做到不断出新，谈何容易！

回想起来，我在投袂李清照研究的早期有幸接连读到了散发着墨香的1979年第一版和1983年第二版夏承焘的《瞿髯论词绝句》。在第一版中，论李清照的共五首，比论苏轼的少半首^①，而在第二版中，增加了首句为“易安旷代望文姬”一首，从而李清照就成了夏老此书中份额最重的一位词人。这对于热衷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笔者来说，不啻为一大幸事。因为我从拜读夏老的一系列学术论著中，开始意识到继踵夏老的词学足迹，不仅不至于南辕北辙，还可以少走不少弯路。事实上，夏老的六首论李清照绝句中，笔者除了对第一首的第二句“身后流言亦意中”之句意及注释有所异见，即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后再嫁，系有若干力证而绝非“流言”，其他二十三句，均堪称警策之论，笔者最为服膺的是第五首。对此将在拙文的第八部分详细解读，在此仅借用此首末句的“易安心事岳王知”引起拙稿之下文。夏老所谓的“易安心事”，是指她与岳飞一样，都具有深沉的爱国情志。而在笔者看来，“心事”除了可以解释为“心志”“忧思”，即心中所思念的事情之外，对李清照来说，联系她“欲说还休”的著名词句，那么“易安心事”还应囊括那些不便径直吐露的内心隐秘。而要破解这种隐秘，通过对其词旨的逆探或谓“以意逆志”^②，不

①《瞿髯论词绝句·苏轼1—5》外还有《苏轼、蔡松年》一首，故称“半首”。

②以意逆志：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是揣度的意思，即用自己的想法去猜度别人的意思。笔者常称此法为“心解”。

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笔者在运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还发出了“‘易安心事’知多少”的自我追问。

这一追问，使我先后发现了“党争株连”“婕妤之叹”……“襁褓丧母”（或谓“幼年失恃”）等等“心事”，总共约计十多桩。对于李清照的这许多“心事”，笔者不是一鼓作气在一本书中探知的，而是在已经出版的十一种拙编著中陆续发现并加以钩沉、稽考的。而这本新著很可能是我有关李清照这一课题的封笔，集“成”之书。所以在这本书中，我将通过对李清照诸多“心事”的进一步厘定、梳理，以期至少在关于李清照诗词的解读中，给读者一个有新意、有条理的总体印象^①。以下将依据李清照的齿位顺序从头说起。

二

幼年失恃的“继母说” 对李清照来说，“失恃”是指她自幼失去亲生母亲的呵护。谈到李清照之母，势必得先从她的父亲李格非的妻室谈起。对此早已发现有出自三种记载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说，李格非娶元丰宰相长女为妻，惜

① 鉴于有关李清照文献记载的极度匮乏，笔者对她的解读主要是通过其诗、词、文、赋。而文和赋又是全面、准确了解易安其人最为重要的途径。又因这本《李清照诗词选》所属的“古代诗词典藏本”整套书的体例不包括文、赋。而对赏析李清照的诗、词而言，是否熟知她的《词论》《金石录》后序和《打马赋》这三篇重要作品是不得同日而语的。承蒙“古代诗词典藏本”出版方俯允，《李清照诗词选》有所破例，而将对《词论》等的注释、鉴赏作为“附录”，从而不仅免除了读者的另加翻检之劳，更重要的是为全面准确地解读李清照其人其作开启了方便之门，这才能得到真正的“总体印象”。

不久去世；一种说李格非之妻系王拱辰孙女。长期以来，两种说法针锋相对，非此即彼。而笔者在用心撰写了有关李清照的数种专著后，从而在1996年济南舜耕山庄李清照年会上提出以下见解——李清照的生母，非此即彼，只有一个；而李格非之妻则极有可能亦此亦彼，即王珪长女早卒后，他再娶王拱辰孙女为继室。笔者的这一拙见已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

关于“继母说”，最初是以提纲的形式公之于学术会议。后来，吉林大学王昊教授对此作了补证（详见《词学》第十五辑）。随之，“继母说”接连被《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花非花名媛诗词系列·李清照诗词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李清照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十大家新传·旷代才女李清照》（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等等多部论著采纳。

但是，对于李清照的这桩心事，笔者至今尚未找到她的有关作品加以证实，这第一种可能因为她当时太小，“少年不识愁滋味”，不谙失恃之苦；第二种可能因为出身于诗书官宦之家的继母没有世俗后娘的恶习，对待聪颖伶俐的小清照如同己出，使她谈不上有什么丧母之痛；第三种可能是这类作品随着其大量作品的失传而失传了。抱歉的是如今笔者年事已高，再无“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劲头，去为李清照的这桩心事发掘新的佐证，这就得靠后起之秀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经过反复查证，“继母说”的根据很充分，完全可以成立，只是李清照是否因生母难产而

“襁褓丧母”的问题则不尽然，即李清照的生母到底是谁，经过再思，眼下又出现了新的疑窦，比如早些年，笔者依据可靠资料已经考证出李格非的卒年约在公元1112年前后，享年61岁。那么，在他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大几。他迎娶王珪长女时任郾州教授，约在其中举之后的1080年。我国古代，年近“而立”的男子尚未初婚者概率极小，所以在娶王珪长女之前，李格非不是没有已婚的可能，也不是没有已生长女的可能。但是从几件事情的时间上判断，李清照系王珪长女所生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来，连同李格非晋升为校对黄本书籍（约在1094年前不久）时，所娶王拱辰孙女在内，他前后可能有三房妻室。而作为长女李清照的生母只能是前二房中的一位，她即使非王珪长女所生，伦理上她仍然是元丰宰相王珪的外孙女。李格非再娶王拱辰孙女时，李清照约在十岁上下。而南宋高宗建炎年间任敕局删定官的李远，被李清照称为“弱弟”，即幼弟，亦即她的异母小弟。

从1996年“继母说”的提出，经王昊教授“补证”，再到本文的这番补充，敢问朋友们，上文可否忝作较为完整的“继母说”呢？

三

遭遇新旧党争及蔡京、赵挺之较量的双重磨难 时起时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新旧党争和同属新党的崇宁政要蔡京、赵挺之的明争暗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赵家对新妇李清照的冷

眼，当是远远有甚于“襁褓丧母”的李清照的第二桩心事。虽说党派之间的争斗历朝历代不乏其例，但是像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那样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普遍而严酷持久的摧残，则罕有其匹，而这一争斗对于一个新婚少妇加害之深尤几近空前绝后。对于这一党争的始末，前人及他人虽有论述，但党争对于李清照的株连，当是首见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陆续问世的数种拙著之中。笔者先是发现李清照很在乎她和赵明诚的新婚纪念日，以至于三十多年后，在她所作《〈金石录〉后序》中仍然深情念及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这一天。这一年，这一天，对于赵、李而言，不亚于他俩各自的诞生之年！然而，“建中靖国”这一年号，只用不到一年就改元“崇宁”了！敏于事的新妇李清照，下意识地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事情比她预感得还要严重。早在李清照降生之前后，“欲使国富”的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而对于这一新法，朝臣持有复不相埒的两种立场。别的不说，仅就与李清照关系十分密切的两位人物而言，一位是她的父亲李格非，一位是其翁舅（俗称公公）赵挺之，便分属冰炭不相容的新旧两党。赵挺之因为拥护和坚决执行王安石变法，除了受到过苏轼门生一系列嘲弄以外，苏轼更指责赵挺之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不配选入馆职做名流等等无端攻讦。为此，两人结怨很深。两党的争斗此起彼伏，旧党得势时，王安石两度下台，神宗皇帝曾惋惜地说：“安石去不以罪！”新党得势，苏轼被贬，新党人物为了罗织他的“罪状”，竟以升迁笼络李格非搜集苏轼的“黑材料”。而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有记载说他是接踵黄庭坚等“苏门四学

士”的“后四学士”之一，为人忠厚，对苏轼惻款有加，宁可被降职外放，也不肯对苏轼落井下石。由于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君臣同在公元1086年去世，继位的哲宗只有十岁，便由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元祐（1087—1094）。

高太后格外爱重苏学士，她听政伊始，苏轼便在很短的时间内连升三级。元祐年间，苏轼及其门墙桃李在朝中可谓举足轻重。岂料，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苏轼等人被一贬再贬。又岂料，哲宗寿短子殇，执政不几年去世后，神宗皇后向氏出于私虑，遴选了赵佶（宋徽宗）这么个昏君后，她又一次废新法，但却不久去世。尔后，朝廷大权由新党人物蔡京和赵挺之等更替执掌。新党以绍述（即继承）神宗熙宁年间新政的名义将建中靖国的年号改为崇宁，将元祐年间以苏轼为首的大臣编为“元祐奸党”。苏轼虽然已经去世，但其弟苏辙和苏轼生前所赏识的李格非仍然受到株连。被编入“元祐奸党”的前后总共计有三百余人，李格非列名第二十六。凡被编为“元祐奸党”者，名单由赵佶亲自书写，刻碑后树立于皇宫端礼门，以示永不任用，也永远不能翻案。因为元祐党人不得在京任职，李格非先是被遣为京东提刑，有记载说免职后他还曾被贬南荒。与此同时，赵挺之却时而被任命为右丞相，时而被任为左相。李清照曾上诗翁舅营救其父，可即使以“何况人间父子情”这种令人同情和伤感的诗句，也未能打动赵挺之，而使她深感“炙手可热心可寒”！

紧接着，党争又直接殃及“元祐党人”的子弟和亲属。当笔者从史书中读到“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

“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如此二苛诏时，直觉告诉我，李清照很难在御赐汴京府司巷的赵相府邸待下去了。我也预感到：李清照这桩天大的心事，一时难以被更多的人所知晓、所认同。于是便改换思路，从她的词作中寻找内证。思路顺畅了，证据便手到擒来，至少有《一剪梅》《醉花阴》《小重山》《行香子》《玉楼春》等五六阙，都或隐或显涉及党争的内容。

四

被颠倒了的“新婚之别” 以往人们几无例外地征引托名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所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作为此词的写作“本事”，从而导致了牵强附会和颠倒事实，造成一系列误读和曲解。

由于李清照的生父和翁舅分属冰炭不相容的新旧两党，她在赵家处境之尴尬不言而喻；加之“党人子弟不得居京”云云的一系列严切诏令，不可能不受政治利害制约的高官赵挺之有足够的理由将此李氏儿媳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可能对她发出“逐客令”……往好处想，即使赵挺之不至于如此绝情，秉性刚克的李清照也不会安于这种尴尬的处境。返回温馨的老家躲避一下风头，这当是她合乎情理的选择。所以，并不是李清照作词送别“负笈远游”的赵明诚，而是她被迫离京与夫君作新婚之别。这一“猜想”，将从下述考察和有关文物中得到证实。